

● [俄]马·伊·戈尔曼 著
陈弘法 译

西方的 蒙古学研究

二十世纪50年代—90年代中期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俄]马·伊·戈尔曼 著
陈弘法 译

西方的蒙古学研究

(中心·人员·社团)

二十世纪50年代——90年代中期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的蒙古学研究:二十世纪 50 年代—90 年代中期/(俄罗斯)马·伊·戈尔曼著;陈弘法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311-7925-2

I. 西… II. ①戈…②陈… III. 蒙古学—研究—西方国家—20 世纪 IV. K3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2129 号

西方的蒙古学研究

(中心·人员·社团)

二十世纪 50 年代—90 年代中期

[俄]马·伊·戈尔曼 著

陈弘法 译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印刷/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数/423 000

版本/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教育出版大厦 9 层

电话/(0471)6608179 6608165 邮编:010010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978-7-5311-7925-2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作者为汉译本专写的序言	1
前 言	3
第一章 战后西方蒙古学的发展阶段	6
确立阶段	6
发展阶段	14
当前阶段初期	16
第二章 西方目前主要的大学蒙古学中心	81
西德和美国	81
英 国	91
法 国	98
斯堪的纳维亚	101
意大利和其他国家	104
第三章 西方曾经存在过的蒙古学中心	196
美国曾经存在过的蒙古学中心	196
德国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曾经存在过的蒙古学中心	204
加拿大曾经存在过的蒙古学中心	205

第四章 西方蒙古学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现状	228
语文学家的培养工作	228
国情学家的培养工作	231
语言教学工作	235
学术工作的组织情况	236
第五章 西方的蒙古学会	249
英国—蒙古学会	250
法国—蒙古学会	254
德国—蒙古学会和德国的其他蒙古学组织	257
美国“蒙古学会”	267
加拿大—蒙古学会	278
结 语	319
引用书目	331
人名索引	421
译后记	441

作者为汉译本专写的序言

亲爱的读者！

在你们伟大的国家能够再次出版我的著作，是我的无上光荣。首次出版的是我的专著《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二十世纪中叶）》。那本专著是尊敬的陈弘法于 1992 年译就的。

十七年之后的 2009 年，这位杰出的老者再次主动承担起将我的新作《西方的蒙古学研究·中心，人员，社团（二十世纪 50 年代——90 年代中期）》译成汉语的繁重劳作。为此，我当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想对我这本书的出版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如果这本书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国专家学者和中国广大读者了解西方有何人又是如何研究蒙古的，西方的蒙古学是如何确立又是如何发展的，那我就相当满意了。

总之，我对在中国能读到我的书并将还能读到我的书感到自豪。为此，我谢谢你们诸位，并祝你们诸位一切顺遂。

马·戈尔曼

2009 年 8 月 17 日

Дорогие читатели!

Для меня большая честь
быть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м во
второй раз в вашей великой
сборке. Первый раз - отби-
рая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зданию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на Западе
ХН и с середины ХХ в. Она была
у вас в 1992 в переводе г-на
Урапасаши Ч.Н. Хук-ра.
И вот спустя 17 лет этот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человек
старик снова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взял на свой тяжелый
труд по переводу на китай-
ский язык и изданию
материалов работы. Много-
во времени на Западе. (Центр
кадры, общества) 50-с сере-
дины 90-х годов ХХ в. от 2007,
за что я пишу сердечное
благодарю.
Я также искренно благодарю

издателей моего книги.

Если она в какой-то степени
поможет китайским специа-
листам и широкой чита-
тель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узнать, кто и как
изучал Монголию на Запа-
де, как там становились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монголове-
дение - я буду очень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

А вообще - я очень рад,
тем, что меня читали и
еще будут читать в Китае.
Спасибо всем вам за
это и все, что вы сделали
для меня.
М. Тавшан

作者为汉译本专写的序言原件(影印)

前言

西方的蒙古学是研究蒙古和蒙古语族的语言和文学、历史和文学、经济和民族学以及当代状况的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时期，并依附于一定的基础——中心、人员和社团。

揭示这些基础，阐明其各个组成部分在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情况，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西方蒙古学的如下特点：西方蒙古学几乎全部集中在大学，并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特点，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学术方向和学术努力。

我的注意力之所以集中在 90 年代及早些时候开展研究活动的几个主要大学的蒙古学中心以及单个学者、蒙古学社团方面，其原因盖在于此。考虑到叙述的完整性，我认为，简要而概括地介绍一下西方主要大学培养蒙古学专家的做法和蒙古学研究现状，是必要和有益的。

此外,我还认为,在对本书主要内容进行叙述之前,专辟一章,将战后西方蒙古学的发展过程划分成几个阶段(自然,这种划分带有假约性质)并加以概括介绍,同时对推动和限制这一发展过程的各种因素加以概括介绍,也当是有益和恰当的。

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作者遇到了极大困难:综述性的著述几乎完全没有,可靠的原始资料也甚缺乏。这样一来,涉及本书的一系列内容,包括学者个人、人员培养等资料,常常只能靠我自己通过建立私人档案的方式,一点一滴地进行积累。我自己的私人档案——询问记录、发言记录、与西方蒙古学家的谈话记录、从西方蒙古学家手中获得的报刊材料和信件等等——建立过程十分困难,加之资料又零星而片断,这就需要我对这些资料尽力反复加以核实。

1990年我在国际蒙古学会秘书处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为我搜集资料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会:我得以接触到这个组织的大量国际卷宗;得以出差到西德,访问过过去和现在与蒙古学有关的西德各大学,会见过西德几乎所有的主要蒙古学家。

本书很大一部分资料来自美国、加拿大、西德、英国、法国东方学和蒙古学社团的学术和学术—信息杂志、通讯,以及国际常设阿尔泰学会的信息通讯,当然还有各辑《蒙古学》年鉴和《国际蒙古学会通讯》。这些信息可补我知识中的某些不足。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际蒙古学会为举办第六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而编印的专辑《国际蒙古学》(1992年第1辑,第2辑),这些专辑中含有西欧不少国家和美国寄来的有关本国蒙古学现状的资料。

我还利用了国内外出版的介绍东方学机构和东方学研究的指南手册,其中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的指南手册、全俄蒙古学家学会1984年出版的《外国东方学中心》以及一系列书目。我还利用了国内外包括蒙古在内的报刊资料。

当然,我首先尽量把一些为数不多但与本书内容有着直接关系的印刷品提供的信息作为基本史料,悉数纳入本书。这些印刷品主

要是由西方蒙古学家丹·西诺尔、瓦·海西希、查·鲍登、罗·阿麦荣、彭·阿尔托等人撰写的文章和小册子。

尽管如此,我所掌握的全部资料也只能允许我将所述基本内容进行到 90 年代下半期的起始时期,且并非各项内容均能达到这一期望,某些地方不完整、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为此,我当预先表示自己的歉意。

总体而言,本书带有指南—信息和历史—认知性质,是俄国蒙古学界在这类工作中的首次尝试。

倘若读者在本书中对诸如战后西方在何地 and 如何研究过蒙古并培养过研究人员、何人在蒙古学领域工作过、何种蒙古学会存在过等问题能够找到答案,那么我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第一章

战后西方蒙古学的发展阶段

确立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蒙古学研究的发展,尽管因国家不同而异,且波浪式地时涨时落,但总体上看来呈上升趋势,分散在西方世界各地的首批蒙古学研究点已经发展成为西方的东方学中研究蒙古语族历史、文化、经济和当前生活状态的一个活跃的分支。

依据其发展的共同情势和影响其发展的诸种因素,从年代学角度可以将西方蒙古学的发展过程假约性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上半期。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自十八世纪蒙古学在法国和德国出现,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直是汉学的一个分支,而在这一阶段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应当指出,蒙古学在这一阶段的最终确立,它在西方的东方学中独立地位的获得,这一过程是在一种相当恶劣的环境中完成的。当时的环境是这样的:一方面,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推行不承认和孤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铁幕”高悬,以苏联为首、包括全部蒙古语族(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正与西方民主国家展开一场“冷战”。这种状

况产生的后果是：西方学术界和社会界与蒙古世界的交往几乎全部隔绝，与蒙古世界的重要学术和文化交流完全没有，来自蒙古世界准确的局势信息、原本著作、教学资料、物质材料、田野考察资料严重缺乏^[1]。

即便如此，战前即已开展研究工作的为数不多的老一辈蒙古学家们和东方学家们，仍在世界蒙古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为蒙古学的研究和专家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这批老一辈学者是：德国的艾里赫·海涅什^[2]、傅海波（赫伯特·弗兰克）^[3]、瓦尔特·海西希^[4]，法国的韩百诗（路易·昂比斯）^[5]，英国的丹尼斯·西诺尔^[6]，丹麦的卡勒·格伦贝赫^[7]，芬兰的彭提·阿尔托^[8]，美国的尼古拉斯·鲍培^[9]、费迪南德·莱辛^[10]、欧文·拉铁摩尔^[11]和柯立甫（弗朗西斯·伍德曼·克利维斯）^[12]。

正是这些学者成了首批在大学中讲授蒙古语言、蒙古文学、蒙古历史、蒙古目录学课程，出刊蒙古古代文献丛刊，制定和实施第一批研究计划和方案，组建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比如，艾里赫·海涅什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当代德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因为“德国的蒙古学研究事业多半为海涅什的学生们所继承”^[13]。他的学生傅海波继承了他在慕尼黑和哥廷根的研究事业；1954年，傅海波组建了德意志联邦首批蒙古学中心之一的慕尼黑黑东亚研究所，并任该所领导人（直到1965年）^[14]。

50年代，在瓦尔特·海西希的倡议和领导下，开始以三种丛刊刊布蒙古文抄本和研究性专著。这三种丛刊是：《Gö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哥廷根亚洲研究》]（1954年至1958年），《Asiatische Forschungen》[《亚洲研究》]（从1959年起），《Monumenta Linguarum Asiae Majoris》（Seria Nova）[《大亚细亚语言文献》（新丛刊）]（从1957年起）^[15]。

1957年，瓦·海西希由哥廷根大学转入波恩大学工作，波恩大学的蒙古学研究随之逐渐登上西德的领先地位，而后再登上整个西欧的领先地位^[16]。

韩百诗在巴黎的其他蒙古学中心和在法兰西学院，遵循他的导师——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法国汉学家—蒙古学家伯希和（保·佩里

奥,1878——1945)倡导的古典传统,复兴了蒙古学研究^[17]。

在英国,伯希和的另一位学生丹尼斯·西诺尔,在蒙古学的广泛组织和广泛普及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借用查尔斯·鲍登所作的权威性结论来说^[18],在伦敦大学东方学和非洲学学院院墙之外,蒙古学“在丹·西诺尔于1948年来到剑桥之前,还是一门几乎不为人知的学科”^[19]。

从1944年起,卡勒·格伦贝赫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了喀尔喀—蒙古语言课程,与他人一起编写了他的第一部蒙古语课本并被西方广泛采用^[20],与瓦·海西希合作刊布了蒙古文抄本。他的学生、著名蒙古学家和突厥学家、奥地利人乌多·波施(1883——1958)曾经这样写道:“格伦贝赫的逝世,使阿尔泰学界失去了一位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失去了一位突厥学界和蒙古学界的博学之士。”^[21]

彭提·阿尔托自1947年在赫尔辛基大学开始其学术和教学生涯之初,即将芬兰蒙古学和阿尔泰学的创立者马·阿·卡斯特伦(1813——1852)和古斯塔夫·约翰·兰司铁(1873——1950)创立的比较—历史方法运用于蒙古语言和阿尔泰语文的研究之中。他们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从60年代起到逝世止也是斯堪的纳维亚公认的蒙古学领军人物^[2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西方被称作尼古拉斯)·鲍培对美国蒙古学作出了贡献。他将自1949年起作为自己在美国的栖息地和工作地的西雅图市华盛顿州立大学变成了当代美国蒙古学的“研究人员培养基地”,变成了美国的首批研究中心之一。专家们认为,他的著述,包括他在西方编写和出版的著述,将为蒙古学家和阿尔泰学家“在整个二十一世纪所引用”^[23]。

另一位著名的移民学者是费迪南德·莱辛。他对美国蒙古学的贡献是在大学中率先开设了蒙古语言文学课程^[24],而对世界蒙古学的贡献则是编写出版了奠基性著作《蒙古语—英语词典》^[25]。这部词典被称作是“一位美国著名东方学家留下的一笔永存的遗产”^[26]。

50年代至60年代初,欧文·拉铁摩尔率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制定并实施了蒙古研究综合计划,在英国利兹大学开设了蒙古学讲座课程。

总的说来,献身于东方学研究 60 年的欧·拉铁摩尔,按照大不列颠前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约翰·科尔文的准确表述,“乃是西方名气最大的蒙古学家”^[27]。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柯立甫。哈佛大学(美国)蒙古学的起步,包括第一部蒙古史料学丛刊专集《Scripta Mongolica》[《蒙古文手稿》]的刊布,以及哈佛大学蒙古学的继续发展,都与柯立甫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据当代美国蒙古学家兼外交家阿丽西亚·坎皮作出的权威性结论,柯立甫的学术著作和教学生涯早在 50 年代“即已确立了他与尼·鲍培、欧·拉铁摩尔并肩而立的地位”^[28]。另一位著名的蒙古学家约翰·克吕格尔(参见第二章注释),则称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的蒙古学巨人、导师和领袖”^[28a]。

这样,所有上述这些学者的活动,他们个人所做的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一方面对于西方蒙古学作为一门教学科目和一项新的学术研究项目在战后发展的开始阶段起到了即使不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总的说来,在西方蒙古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个人因素永远具有特殊的而且几乎即使不是决定性意义,起码也是头等意义^[29]。

战后西方蒙古学起步阶段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原因在于受到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开始出现的普遍高涨形势的刺激和现实生活中多方面的召唤,而西方的东方学出现普遍高涨形势又是由一系列综合因素促成的。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了客观变化——殖民主义崩溃,亚非各族人民得到民族复兴,新的独立国家成立并在世界过程中发挥作用,等等。这种变化的结果,将东方推向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前台。

于是,便有了西方诸大国既对地区性的又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追逐和意识形态的谋求,以及为争夺影响范围和吸引“第三世界”站到自己一边所作的努力,由此他们也便为保障自己的东方政策而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对加强东方学和东方学研究产生了需求。

此外,还有西方社会界和学术界对东方学研究兴趣的不断增长,对东方独特文明在世界命运中所起作用 and 所具意义的理解,对东方国家发生的革命和变革过程的努力思考,以及其他等等。

50年代中期著名的美国东方学家、前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文·赖肖尔曾这样写道:“我们对亚洲总的理解程度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的亚洲政策。我们的亚洲政策将会对亚洲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而亚洲的未来又在许多方面将决定世界的未来。”^[30]

他的意见得到了另一位大学者、汉学家费正清的赞同。在对东方学家面临东方的变化所应承担的任务作了一番描述后,费正清强调说:“对于亚洲专家来说,亚洲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生活中发生的革命性变革,正是专家们对亚洲进行研究的基本意义所在和最终结果,而且这种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我们对亚洲出现的这些革命性变化仅凭想象就应当感受到……,如果我们想在当代世界存活下去,而不想死去的话。”^[31]

下面是欧·拉铁摩尔对直接研究蒙古的意义所说的一段话——这是他1979年对蒙古俄文报纸《蒙古新闻》记者说的:“可以说,对蒙古所作的研究可以帮助我理解我所存活的这个世界。当我听到一些事件,比如发生在伊朗或者阿富汗的事件,我就总会将这些事件与蒙古的例证进行比较,这样就会帮助于我对这些事件作出更深刻的理解。”^[32]

欧·拉铁摩尔认为,蒙古“是苏联援助欠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样板”(可惜,历史表明,他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并告诫西方,“就此而言,蒙古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研究这一经验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来说具有无比珍贵的意义,因为与经济援助计划中的竞争相比,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国际竞争都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33]。

直到50年代末,西欧特别是美国蒙古学研究状况依然不能适应学术界和现实生活的需求,而这种令人相当失望的研究状况也就成为包括蒙古学在内的西方东方学普遍高涨的刺激因素、起始缘由和某种意义上的出发点。这一点,有各种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和议案^[34],各种亚洲问题讨论会提供的材料^[35],东方学家、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在报刊上刊登的批评性发言和文章^[36]

为证。

除了对不足特别是与苏联东方学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37]相比显得尤其无法容忍的不足进行批评之外,这类文章和材料中还包含了对西方的东方学事业的重组和发展所作的介绍。总体看来,西方的东方学事业是以大学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东方学发展的措施为其发展基础的。

比如,在英国,由英国外交部于1946年组建的、由斯卡波罗勋爵领导的部际东方语言、斯拉夫语言和非洲语言教学委员会,于1947年春提出了关于东方学研究现状的报告。在该委员会的推动下,英国政府拨出相当数量的款项用于1947年至1952年期间开展的包括蒙古语言在内的主要东方语言和非洲语言的系列研究。系列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伦敦大学东方学和非洲学学院进行^[38]。

1959年,“斯卡波罗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特的保障东方学发展的国家机构被英国劳工部大学拨款委员会东方学和非洲学小组委员会所取代。

这个以威廉·海特为首的小组委员会在对全部西方各国东方学的现状做了研究之后,于1961年提出报告。报告指出,在培养东方学家的语言学和国情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不足。随后,根据这个小组委员会的建议,于1966年之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和非洲学学院组建了五个区域性中心,其中包括一个培养蒙古学家的远东专门分部^[39]。

在联邦德国,对东方学的需求问题是由德国学术研究协会下设的专门“计划小组”——一个负责协调和管理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央一级的国家—社会组织进行研究的。这个小组(顺便说一句,傅海波也参与其事)于1960年提出并公布了《东方学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在加强对东方特别是中国、中央亚(内亚)的研究方面,在增加联邦和地方用于研究的费用方面,在组建新的研究中心和专门性的学术计划和方案方面,均起到了很大作用^[40]。

在美国,战前的东方学传统弱于欧洲。美国东方学会亚洲研究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埃·施佩泽教授曾形象地说过,美国直到“日本炮火在珍珠港发出轰鸣之后,才将东方学者们置于关

注的中心,将他们推到事件的前台,而他们本人对于这种情况却甚不习惯,他们的学术素养也甚不适应”^[41]。为了发展东方学,美国采取了许多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措施。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为东方学研究获得联邦预算的财政支持而创造良好条件的立法条例,如:1946年的富尔布赖特—海斯法案^[42],1947年的斯密特—蒙德补充法案^[43],特别是1958年的《国家国防教育法案》^[44]。最后这个法案,对美国阿尔泰学和蒙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重大的影响。

该法案第六条规定,仅在1959年至1963年期间,每年用于东方语言研究的国家奖励基金即达174项(每项基金为1000美元);其中,用于包括蒙古语言在内的阿尔泰语言组研究的有70项^[45]。

根据该条规定,负责发展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组织各学会开展活动的主要计划—协调机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受美国教育部的委托,制定并实施了编写乌拉尔—阿尔泰地区诸民族语言、历史、地理、文化教材和参考资料的五年纲要^[46]。编写规模,可以从编写结果看出:从1959年至1963年,来自42所大学、学院和科研机构的74位学者共编写和出版教材116种,制成微型影片教材25种,等等^[47]。

在这一纲要中,“蒙古研究计划”占据着中心位置。根据这一“计划”的要求,编撰了蒙古语言及其方言的教学资料(词典、语法课本、文选读本等等)16种^[48],编写了有关中央亚、乌拉尔—阿尔泰和蒙古的一般指南手册^[49],出版了罗·鲁彭的两卷集专著《二十世纪的蒙古人》^[50],等等。

在纲要实施的五年之间,美国共耗资70万美元^[51]。从1959年到1976年,用于语言研究和包括蒙古在内的乌拉尔—阿尔泰地区本身研究的拨款,约120万美元^[52]。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国防教育法案》第六条有关拨款的规定,依然是联邦政府资助研究亚洲语言和地区计划的法律依据。根据该条规定,联邦政府在70年代至80年代平均每年拨款1.5亿美元^[53]。

对美国东方学的重组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还有1954年设立